

性别与阶级的交融

——略论早期中共妇女工作思想

彭敦文^{1, 2} 万娟¹¹

(1.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1;

2. 武汉大学 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 湖北 武汉 430071)

【摘要】 性别和阶级既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历史的两大重要范畴, 也是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两大重要主题。受五四女权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影响, 早期中共注意到了妇女解放运动中性别和阶级的复杂关系, 既承认男女两性受压迫的阶级共性, 又承认妇女受压迫的性别特殊性, 力求通过寻找性别与阶级的契合点, 构建新的妇女解放话语体系。在具体革命斗争实际中, 早期中共既强调阶级自觉下的性别合作, 又突出统一战线中的阶级联合与斗争, 努力推动中国妇女解放实现个性解放与阶级革命融合发展。这种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无疑是早期中共推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初步尝试, 具有历史和现实双重意义。

【关键词】 中共 性别 阶级 妇女工作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477 (2021) 10-0123-08

性别和阶级既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历史的两大重要范畴, 也是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两大重要主题。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 中共如何处理性别与阶级的关系, 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目前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 主要有三种视角。第一, 坚持唯物史观, 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置入近代中国历史语境论证其合理性。如学者韩贺南论证了中共将妇女解放纳入民族和阶级解放的历史必然性, 认为其立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状, 根植于“我在家国中”的文化土壤, 顺应了 20 世纪劳动解放、民族解放、妇女解放三大历史潮流。^[1] 杨剑利提出近代中国的妇女解放伴随着国家建构, 这是审视近代中国妇女解放不可回避的历史语境, 并提出了男性主导、性别合作这种异于西方的模式。^[2] 日本汉学家小野和子针对西方女性主义者批判中国妇女缺乏女权意识的问题, 提出这产生于双方不同历史背景, 中国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 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远远超过了两性间的对立, 因而中国妇女的解放是通过大的社会变革实现的。^[3] 第二, 受西方女性主义影响, 借助社会性别理论, 主张重新建构一种以女性立场为中心的历史。如李长江、杜芳琴等学者试图将社会性别理论引进中国妇女史研究并进行本土化探索, 指出传统妇女解放理论不足之处在于将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混合在一起, 消解了妇女解放的独立内涵, 并提出社会史完全应该也必须引入性别的角度, 从而打破以往单一的阶级(阶层、社群)社会分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4] 美国学者王政指出, 由于妇女解放从属于阶级斗争, 致使中国革命始终未能打破妇女受压迫的根源——父权制家庭, 未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5] 孟悦、戴锦华甚至质疑中国妇女解放运动, 认为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自发的、以性别觉醒为前提的运动。^[6] 第三, 从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以及相关文本的具体分析中, 揭示性别和阶级交织的复杂关系。如黄文治对大别山区妇女婚姻自由问题进行个案探讨, 揭示婚姻自由和阶级革命既相伴而生又相悖推进。^[7] 韩贺南结合历史语境对中共首部妇女运动决议及相关文献进行研究, 提出妇女解放与劳动解

作者简介: 彭敦文(1964-), 男, 历史学博士,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万娟(1980-), 女,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放联盟是源自对共同消灭私有制、反抗阶级压迫的现实选择。^{[8] (p67-74)} 宋少鹏立足“土地”和“婚姻”两个观察点，以国统区报纸、中共的工作文献、口述资料来考察苏区妇女运动中的“性别中的阶级”和“阶级中的性别”，强调将劳动妇女作为社会阶级基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运动最宝贵的历史经验。^{[9] (p42-50)} 美国学者克里斯蒂娜·吉尔马丁从社会性别角度探索了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与共产党党内的性别、政治与社会动员问题，揭示了中共革命女性的女权意识与阶级革命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指出尽管男性领导人积极倡导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但他们从未在党内认真重建新的社会性别关系。^{[10] (p3-37)} 尽管学者们的研究视角不同，但都揭示出性别与阶级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一个中心论或者是二元对立论所能概括的。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早已指出：“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11] (p70)}

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共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站在新时期，回溯早期中共对性别与阶级之关系的认识和实践，考察中共推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早期思考和探索，从历史中汲取经验，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不仅是历史必然，更是时代要求。本文围绕性别和阶级这一主题，以早期中共妇女运动相关决议、中共妇女运动代表人物发表的相关文献及其阐释的主要观点为基本材料，结合早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践，探寻早期中共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探索，以期总结其经验启示。

一、有阶级的妇女：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植入

近代中国妇女解放从缘起上属于性别范畴，目的是解决妇女受压迫问题，实现男女平权。直到“五四”时期，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妇女解放才逐渐被纳入阶级解放的范畴。

（一）男女平权思想的提出。

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了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的伦理纲常，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四大绳索，将广大妇女束缚在家庭之中，致使其经济上依附于人，人格上不能独立，社会上没有地位。19 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维新派志士，明确提出了男女平权思想，认为“女子当与男子一切同之。此为天理之至公，人道之至平”，^{[12] (p100)} 并指出女性应与男性平等拥有教育权、政治权、法律权等各项权利。资产阶级革命派延续了这些思想，并进一步提出女性应享有入学、交友、营业、掌握财产、出入自由、婚姻自由等权利。^{[13] (p50-52)} 新文化运动除了继承上述男女平权思想，还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格独立的束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反思和批评。指出：“女子被人把‘母’‘妻’两字笼罩住，就轻轻地把人格取消了。”^{[14] (p255)} 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作品《玩偶之家》推出后，更是让“娜拉”成为五四新女性的典范。女主人公娜拉离家出走，不再依附丈夫，不再做男性的玩偶，只因为她觉悟了自己“也是一个人”。^{[15] (p489-507)} 娜拉离家出走，被赋予了除了人的解放之外，女性走向解放的性别意义。

应该说，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妇女往往被看成一个内在统一、没有身份差异的概念，被赋予了强国保种的责任。这一时期的妇女解放主要是从性别视角出发，争取男女平权，获得和男子一样的权利和地位。由此，反对男性专权的女权运动蓬勃发展，成为这一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主流。对此，向警予对女权运动的意义做了很好的概括：“免除性的压迫，发展男女同等的本能，和争回妇女应有的人权。”^{[16] (p117)}

（二）从“伊是女人”到“伊是穷人”的转变。

“五四”运动后期，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具有阶级意识的妇女观才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妇女的解放与整个受压迫阶级的解放密不可分，只能在阶级压迫被消除和私有制被消灭之后，性别平等才能实现。受此影响，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运用这一理论阐释中国妇女解放问题。

中共创始人之一李达在《女子解放论》一文中从生产资料私有制、家庭两性关系方面分析妇女问题的根源。他谈到，原始时代是以两性为中心的，后因社会变革，渔猎时代进入畜牧农工时代，男子的劳力用于农耕畜牧者多，从而在事实上将女子驱逐出

来，单变成男子独占的事业。因此，“女子征服的起源，与奴隶一样”。^{[17] (p21)}文章进一步指出，在父系私有制下，为保证父子关系的明了，男子便想出种种方法限制女子性欲，久之成为习惯。此时的女子，由于无财无势，“不得已抛弃过去的独立光荣历史，到了这堕落与屈从的道路”。^{[17] (p21)}可见，李达认为私有制、阶级的出现是导致女性处于屈从地位的根本原因，这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关于女权衰落的观点基本吻合。

作为中国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从阶级视角对女权运动和劳动运动进行了深入分析。《战后之妇人问题》一文指出，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妇女的要求，全然相异，前者是“想管治他人”“想在绅士阀的社会内部有和男子同等的权力”，后者是“想把自己的生活由穷苦中释放出来”“除要求改善生活以外，别无希望”。^{[18] (p146)}李大钊认为“中产阶级妇人的权力伸张，不能说是妇人全体的解放”。^{[18] (p146)}他还对妇女解放道路给出了初步答案：既要“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又要“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18] (p146)}

田汉把妇女分为“君主阶级”“贵族阶级”“中产阶级”“劳动阶级”四类，并分析前三种阶级的妇女运动“不思最初女子何以屈服于男子而失去其地位的缘故”，但求参政而已，真正彻底的革命是第四阶级的妇人运动，即“妇人的劳动运动”。^{[19] (p270)}陈望道也把妇女分为第三阶级和第四阶级，认为第三阶级妇女运动是“女人对男人的人权运动”，第四阶级妇女运动是“劳动者对资本家的经济运动”。^{[20] (p1)}他进一步指出，中产阶级的妇女运动即使完全达到目的，得到的也只是有产阶级中的男女平等，“要得到‘人类平等’，还须另外给一点注意在第四阶级女人运动”。^{[20] (p2)}

陈独秀认为阶级解放是妇女解放的根本出路。他在李超追悼会上的演说，¹以及随后撰写的《男系制与遗产制》等文中，将李超之死归咎于私有制社会的压迫，并考察了造成男女不平等、女子受奴役压迫的具体原因，认为是在私有制发生后，女子在家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变为个人的私有物，并提出了废除父系制、改革遗产制、铲除人类的占有性和私有制三大主张。^{[21] (p475-477)}关于如何废除私有制，陈独秀认为在当时的经济制度下，妇女不是做家庭的奴隶就是做东家的奴隶，因此“非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来改造社会制度不可”。^{[21] (p17)}他还强调，社会主义是女性实现自身解放的唯一路径。^{[21] (p104-105)}沈玄庐也认为劳动者和妇女受压迫源于阶级制度，必须要解决“压迫在劳动与妇女上面的阶级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制度”。^{[22] (p86)}

（三）新的妇女解放理论的建构。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一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中国妇女解放的认识，不再仅仅立足于性别视角、局限于以往那种呼吁解决社交公开、教育平等、经济独立、婚姻自由等具体问题，而是通过引入阶级分析方法，把废除私有制的社会制度作为妇女解放的前提条件，从而促进妇女与一个新兴阶级力量的融合，这是中共妇女解放思想与此前妇女解放思想最大的不同之处。这一全新的理论背后是对一个私有制消灭之后，不存在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想象。由此，妇女解放和阶级解放找到了契合点。首先，地位相同，妇女和无产阶级都处于被奴役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其次，根源相同，二者受压迫的根源都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最后，目标相同，妇女解放作为人类解放的一个子系统，其最终目标都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李大钊曾预言资本主义崩坏后，生产方法由私据变为公有，分配方法由独占变为公平，男女关系也将实现自由平等，“只有人的关系，没有男女的界限”。^{[23] (p219)}

应该说，早期中共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妇女解放的前景及现实道路做出了全新解答，提出了系统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包括妇女问题的根本之道，远远超过了其他各种思潮、主义，对动员、整合知识群体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作为北京工读互助团成员的施存统，在《星期评论》中指出工读互助团实验带来的两大教训：“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来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之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24] (p4)}面对内忧外患的历史形势，以“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为中心的解放思潮逐渐替代了“个人解放”的乌托邦方案，主导了此后“解放”观念的内涵。由此，以彻底变革社会经济基础为目标的社会阶级革命，就成为实现妇女解放的现实选择。中共早期妇女运动领袖向警予认定：中国妇女不能死板效仿18世纪欧美女权运动的旧程式，只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实现自身的真正解放。^{[16] (p157-159)}然而从本质来说，这种妇女解放思想是为阶级和民族解放服务的，这也为日后党内长期存在的性别从属于阶级的立

场埋下了种子。

二、挥之不去的性别关怀：五四女权思想的延续

在运用阶级视角分析妇女问题时，一批早期中共创始人仍秉持五四时期对女性的持续关注，认识到性别与阶级之间的差异，并对妇女自身解放进行了理论和实践探索。

（一）对性别与阶级差异的辨析。

李大钊曾谈到阶级的可变性和性别的不可变性，他认为“社会上一切阶级都可变动，富者可变为贫，贫者可变为富，地主资本主可变为工人，工人亦可转为地主资本主……独有男女两性是一个永久的界限，不能改变，所以两性间的 Democracy 比什么都要紧”。^{[25] (p349)} 沈玄庐也认为妇女问题比劳动问题复杂得多，因为不论哪一项劳动，都可以脱离资本家而由劳动者自力去经营，但“无论哪一个男子，都不能加入妇女负担孕乳婴儿的责任”。^{[22] (p84)} 沈雁冰也认为，男女两性的性道德不平等，是“第一解放”，但“解放”不是让女性效仿男性的霸权，而是创造出两性共同遵守的新道德。^{[22] (p59-63)}

1922 年中共二大起草的首部妇女运动决议进一步揭示出，妇女受资本家和男子“双重压迫”，是家庭和资本家的“双重奴隶”。^{[26] (p29)} 可见，早期中共认为，妇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受的压迫带有性别与阶级的双重性质。在关注阶级解放的同时，也对性别解放给予足够的关注，是早期中共的主张。正如陈独秀所言：“固要帮助劳工抵抗资本家压迫，尤要帮助妇女抵抗男子压迫。”^{[22] (p80)}

早期中共对女性问题的持续关注，也与其早期成员构成及其思想背景有关。早期中共党员群体多受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影响，在妇女解放思想中或多或少蕴含了自由主义女权思想的成分。正如李达所言：“提倡女子解放，不可不学欧美各国的样子。”^{[17] (p24)} 有研究者认为，“中共早期的性别意识形态是许多思想资源综合体，其中最主要的是五四女权思想和恩格斯对于家庭的批判。恩格斯将家庭视为妇女受压迫首要地的唯物主义分析，与五四知识分子产生共鸣，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正当化了共产党人对家庭的持续谴责”。^{[27] (p90)}

（二）对妇女特殊利益的关注。

尽管早期中共引入了阶级分析方法来划分妇女的不同身份，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站在妇女群体的立场上来看待妇女解放问题。早期中共对妇女解放的认识，仍包含对妇女争取婚姻自主权、社交公开权、财产继承权以及参政权等内容。中共二大妇女运动决议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除努力保护女劳动者的利益而奋斗——如争得平等工价、制定妇孺劳动法等之外，并应为所有被压迫的妇女们的利益而奋斗。”“帮助妇女们获得普通选举权及一切政治上的权利与自由；保护女工及童工的利益。”^{[26] (p30)} 三大、四大妇女运动决议也提出了“打破奴隶女子的旧礼教”“男女教育平等”“男女职业平等”“女子应有资产承继权”“女子应有参政权”“男女社交自由”“结婚离婚自由”“女子应有参政权”“男女工资平等”“赞助劳工妇女”“保护母性（生产期前后休息六星期不扣薪资）”等一系列维护妇女权益的主张。^{[26] (p68, 281)} 1922 年 8 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拟定了劳动法大纲，规定女子劳动者“产前产后均予八星期之休假，其他女工，应予以五星期之休假，休假中工资照给”，^{[28] (p51)} 以法律的形式保护妇女。1926 年 3 月，省港女工代表大会召开，提出制定女工保护法，这是第一次为女工争取劳动立法的会议。湖南、江西、湖北等一些地区还以农民协会的名义通过农妇决议案，要求农妇在政治、教育、婚姻、财产等方面与男子享有同样的权益。国民革命时期，中共还通过妇女团体、工会、农协，发动妇女剪发放足，争取婚姻自由，援助受虐待妇女，切实为妇女谋利益。

（三）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的结盟。

早期中共已经侧重从经济角度关注妇女尤其是劳动妇女解放问题。李大钊用唯物史观考察妇女地位的历史演变，指出：“妇

女在社会上的地位随着经济状况变动。”^{[23](p217)}陈独秀也总结女子丧失人格完全是经济问题，“如果女子能够经济独立，那么必不至受丈夫的压迫”。^{[21](p108)}关于如何实现妇女或者是劳动妇女解放，早期中共认为必须将重点放在争取经济独立上，而争取经济独立，第一步便是要实现劳动解放。向警予更是一语见的，将劳动解放与妇女解放比喻为“天造地设的伴侣”。^{[26](p78)}中共四大妇女运动议决案也揭示妇女被奴役的根源就是私有财产制度，认为“劳动解放运动正是向废除私有制度方面前进，故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实有极大关联”。^{[26](p279)}这些观点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的思想。

自此中共领导的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劳动解放成为妇女解放最核心最关键的内涵，并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得到不断巩固和强化。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写的决议中指出：“妇女占人口的半数……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29](p30)}1933年，毛泽东将推动妇女参加生产作为农业生产方面最基本的任务。^{[30](p132)}194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也充分肯定广大妇女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与壮丁上前线同样光荣，并指出须从经济丰裕与经济独立入手，这不仅有利于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也能帮助妇女挣脱封建压迫。^{[31](p647-648)}1948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目前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的决定》，强调当时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的方针，是动员和组织广大妇女群众积极参加生产。^{[32](p301-303)}

中共强调的以生产为中心的妇女解放思想，理论上源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现实上有利于提高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地位。但同时也要看到，以经济独立和劳动解放为核心的妇女解放，也导致了女性的双重负担问题，即一方面要承担社会生产，另一方面又要承担家庭劳动。1942年，作家丁玲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三八节”有感》，特别关注了已婚且生育的妇女在家务劳动上遭遇的性别歧视和压迫。对于如何实现恩格斯所描绘的生产资料社会公有之后，私人家庭成为社会的劳动部门，孩子抚养和教育由此也成为公共的事业的目标，延安道路尚未给出答案。由此说明，让妇女回到公共领域，参加社会劳动，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社会生活方面的参与，更多的只是立足于“无性化的人”来强调“男女平等”，而忽略了立足妇女自身性别的“有性化”的解放之意。

三、冲突应对之策略：阶级中的性别和性别中的阶级

早期中共在处理性别和阶级关系时主要面临两大问题：一是无产阶级内部两性之间的冲突；二是妇女群体中不同阶级，特别是劳动妇女运动与女权运动之间的分歧。

（一）阶级自觉中的性别合作。

中共三大妇女运动议决案专门谈到了男工女工间的冲突，导致女工在工会中常感觉男工压迫侮辱之痛苦，另思组织女工会。关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中共给出的答案是，号召男女工亲密团结，扫荡男工轻侮女工的习惯与成见。“至接触女工初步方法，或办工儿院，或办女工夜学，亦方法之一，并可斟酌情形因期制宜。”^{[28](p62)}可见，早期中共将工人内部的性别冲突归结于宗法社会轻蔑妇女的习惯与成见，巧妙化解了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对立关系。李大钊指出，劳工妇女“应该有一种阶级的自觉，与男子劳工团体打成一气，取一致的行动”。^{[28](p40)}中共四大妇女运动议决案更是直接对“无谓的男女界限的争执”进行了批评，指出其“足以妨碍妇女运动与民族运动、劳动运动的密切关联”。^{[26](p281)}

为了进一步减轻性别冲突，中共还将性别压迫的根源指向社会制度，号召共建男女两性为本位的理想社会。李达在《女性中心论》译书序言中，大声疾呼有志改造社会的男女们：“共同携手参与改造事业……建设男女两性为本位的共同生活的社会。”^{[33](p105)}黄璧魂也指出，一切妇女问题，都掩蔽在由阶级制度产生的经济制度下面，并号召“打破阶级和改造经济制度，我们妇人和农工人当一致努力！”^{[34](p315)}向警予在介绍和总结女工运动经验时，认为之所以取得胜利的原因在于男工女工一致对抗外国资本家，^{[26](p89)}并强调男女工人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以及加强两性合作的重要性。可见，淡化性别矛盾，突出男女合作，共建理想社会，是早期中共对待阶级中的性别冲突的一大策略。他们还一直强调妇女受压迫是有产阶级的男子造成的，“轻视女

性，视女性为玩物的，不过是那班老爷、少爷们罢了，至于无产者则绝不至如此”。^{[35] (p217)} 由此，中共回避了同一阶级不同性别的等级秩序问题，形成了以阶级利益为重，性别服从于阶级的基本立场。1931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扩大劳动妇女斗争决议案》强调妇女群众的利益主要是她们的阶级利益，申明妇女的特殊要求不能超过阶级范围，并呼吁妇女参加革命斗争和为她们的特殊利益而奋斗。^{[36] (p147, 150)} 正如有学者所言，这一话语体系成功化解了性别解放与民族国家建构、政治解放的内在紧张关系，解除了在民族国家生存危机面前一味张扬性别解放面临的内在道德压力。^{[37] (p60)}

（二）统一战线中的阶级联合与斗争。

早期中共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认识到不同阶级的妇女有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立场，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中共“三大”妇女运动决议明确把妇女运动分为“劳动妇女运动”和“一般妇女运动”两大类。中共四大妇女运动议决案深入分析了“一般妇女运动”的政治取向，认为贵族妇女运动仅注意于上层妇女运动，应指正其错误并给予解放的同情和赞助；教会妇女运动具有买办阶级化的特征，应给予严重而又诚恳的批评以促醒其觉悟；小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有倾向革命的可能，应切实指导使之革命化。同时，决议还指出，劳动妇女运动在中国虽仍处于极其幼稚的状态，但已表示出其阶级斗争能力，应有系统地、有组织地加入指导。^{[26] (p280)}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前，尽管中共妇运先驱一直批评女权运动的精英特色和缺乏群众基础的“法的运动”方式，但早期中共“对女权主义采取‘联合’而不是排斥的态度，使其与劳动妇女的运动互为补充、互相促进，而又以后者为妇女运动的中心，是早期共产党人采取的基本立场”。^{[38] (p22, 23)} 这一点从共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青年妇女运动决议案中可见一斑。该决议案指出，应在有女子参政协进会、女权运动同盟会、女界联合会等的地方，从事宣传引导工作，加以马克思学说观点的批评，指出妇女运动与劳动运动密切的关系。同时吸收其中有革命精神及活动能力的分子，做我们的同志。^{[39] (p47)}

李大钊在《现代的女权运动》中也提出了两点意见。其一，他将中国妇女运动纳入世界妇女革命的整体，认为“妇女要想达到伊们完全解放的目的，非组织一个世界的大联合不可”。^{[28] (p39)} 其二，就妇女运动中各阶级妇女发展不平衡问题，他客观地指出，各国女权运动，都发源于中流阶级，劳动妇女运动比较后起，并认为女权运动与劳动妇女运动“并不含有敌对的意味，而且有互相辅助的必要”。^{[28] (p40)}

中共妇女运动的“革命祖母”向警予对女权运动的态度是既批评引导又合作包容。一方面，向警予经常在各种场合批评女子参政运动排除了大多劳工妇女，成了女子个人做官做议员的运动。另一方面，在向警予负责起草的中共三大妇女运动决议案中，特别提醒“不要轻视此等为小姐太太，或女政客们的运动”“阶级的主义的色彩不要太浓”。^{[26] (p68)} 同时，向警予还发起组织广东女权运动大同盟，并担任第一届会长。可见在斗争实践中，中共虽然强调妇女的阶级身份认同，但并不提倡阶级对立，在动员妇女参加革命、创建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目标下施行了“带动”“团结”“融合”其他阶级女性的包容策略。

这一策略虽然离不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但也是早期中共基于劳动妇女力量有限，为扩大妇女运动统一战线做出的现实选择。陈望道指出，“第四阶级女人运动，无论那国，都发生在男人劳动运动之后”，在中国男人还多不了解劳动运动的情况下，“第四阶级女人运动自然更无希望了”。^{[20] (p2)} 沈雁冰也认为“第三等的妇女。……天天在生活压迫之下，……他们每天和生存奋斗，没有时间受教育，也没有金钱受教育；他们环境又坏，思想是几乎没有的，只有冲动”，^{[40] (p7)} 靠他们去运动妇女运动是很难的。他寄希望于中等人家的太太和小姐，认为这一等妇女在社会中占半数，不必忧虑生活，有机会受教育，“骄贵的习气不曾染到，勤劳的本能不曾汨没，他们是有思想，有道德，有勇气去做事，有胆去耐苦，妇女运动必须这等妇女做了中坚，那方能有个实在的效果出来”。^{[40] (p8)}

可见，一方面，中共用“阶级”彰显妇女内部的差异，力图寻求知识妇女对劳动妇女群体和劳动妇女运动的关注和支持，以便扩大社会革命的基础。高君宇直言：“现在中国妇女要求参政的呼声，是少数特权阶级妇女与官僚议员争座位的活动，……与‘妇女解放’四字丝毫不发生关联。……女权运动惟有与工人运动并着前进，才能做到真正的解放。”^{[41] (p65)} 1925年5月，全国

性女权组织中国妇女协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向警予到会并发表了希望其关注下层工农妇女，参加民族运动谋求妇女解放的演讲。在中共的影响和推动下，该组织在五卅运动中，提出与英、日绝交，提倡国货、关税自主等主张。此外，女权运动同盟会在其宣言中，也把女权运动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并开展关注劳动妇女的活动。如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提出了同工同酬、保护母性、制定保护女工法等要求。^{[26] (p60)}

另一方面，中共也注重用“性别”认同来寻求妇女内部的团结。在国民会议运动中，向警予提出组织一个中华全国女界国民会议促进会，并提出妇女有自身的特殊利益，要求承认妇女团体作为独立政治组织参政。向警予曾阐释了妇女团体加入国民会议的理由，认为若没有妇女团体，那么妇女本身的利益要求就难以实现，就失去了同敌对势力相抗争的力量，最终也就会失去妇女群众对革命的拥护和奋斗。^{[42] (p4-5)} 在向警予、刘清扬、杨之华的推动下，1924年12月21日，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正式成立，随后迅速扩展到天津、广州、北京、汉口等地。1925年3月1日，在北京召开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这场民国以来最大的具有广泛人民性的政治集会上，共有15个地区的26位妇女参与其中。经过中共的推动，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成为国民会议运动中的重要力量，在反对军阀统治、争取民主权利中彰显了妇女的作用和力量。正如向警予所言：“是中国妇女运动在同一的目标、同一的策略之下，有系统、有计划的进行的历史之序幕！”^{[43] (p2)} 在寻求妇女运动统一战线思潮的影响下，各地也纷纷成立领导妇女运动的团体组织。1925年5月10日，广东妇女解放协会正式成立。该会为妇女解放和民族利益而奋斗，积极支援省港大罢工、东征、南讨和北伐，开展农妇和女工运动，援助受迫害的妇女，成为大革命时期党领导广东妇女的重要助手。

四、结语

中共早期妇女解放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五四女权思想双重因子。一方面，早期中共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妇女解放的前景及现实道路做出了全新解答，系统化提出了解决妇女问题的根本之道。另一方面，延续了五四女权思想，在承认男女两性受压迫阶级共性的基础上，又承认妇女受压迫的性别特殊性，将妇女的特殊利益与动员妇女参加阶级斗争直接联系起来。在具体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早期中共既强调阶级自觉下的性别合作，又突出统一战线中的阶级联合与斗争，努力推动中国妇女解放实现个性解放与阶级革命融合发展。这一妇女解放思想及其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消融了民初女权运动中男女两性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促进了革命阵营的统一与合作，增强了革命阶级中女性的力量。同时，也让寻求个性解放的“娜拉”们找到了新的阶级盟友和现实归依，让妇女解放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早期中共推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中国化的探索，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

但也应当看到，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受到父权制的影响，妇女解放问题存在复杂性和长期性，中共在相关的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一定历史局限性。首先，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在阶级与性别冲突时，不可避免会出现以阶级整体利益代替妇女特殊利益，遮蔽妇女解放特殊性和差异性的做法，导致妇女解放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男性化的解放，缺乏性别解放的自身特质。其次，中共突出强调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的关系，主张妇女参与社会生产，但却忽略人口生产和家庭劳动的社会属性，未有效解决妇女解放面临的社会劳动和家庭劳动的双重压力。再次，中共认为妇女受压迫源于私有制经济，将妇女与生产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直接遮蔽了妇女与婚姻家庭制度的关联，仍未冲破父权制家庭结构对妇女解放的束缚。最后，妇女的最终解放是实现自身全面自由的发展，妇女解放不仅要获得“人”的生存条件，而且还要在此基础上成为“妇女”自身。这些问题不仅是近代妇女解放运动尚未做出科学回答的历史问题，也是当代中国妇女解放事业仍需面对的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 韩贺南. 中共将妇女解放理论纳入民族解放的历史必然性及理论支撑[J]. 中共党史研究, 2012, (6).

[2] 杨剑利. 国家建构语境中的妇女解放——从历史到历史书写[J]. 近代史研究, 2013, (3).

[3] Ono Kazuko. Chinese women in a Century of Revolution 1850-1950[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 [4]杜芳琴,王向贤.妇女与性别研究在中国[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 [5]Wang Zheng.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Oral and Textual History[M].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 [6]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 [7]黄文治.“娜拉走后怎样”: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及阶级革命——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历史考察(1922~1932)[J].开放时代,2013,(4).
- [8]韩贺南.阶级与性别的“联盟”——中共首部妇女运动决议及相关文献研究[J].党的文献,2011,(1).
- [9]宋少鹏.苏区妇女运动中的性别与阶级[J].妇女研究论丛,2012,(1).
- [10][美]克里斯蒂娜·吉尔马丁.国民革命时期(1924—1927年)的性别、政治文化和妇女动员[A].李小江,朱虹,等.性别与中国[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 [1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12]康有为.大同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13]金天翮.女界钟[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14]女子人格问题[J].新潮,1919,(2).
- [15]胡适.易卜生主义[J].新青年,1918,(6)
- [16]向警予.向警予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 [17]李鹤鸣(李达).女子解放论[J].解放与改造,1919,(3).
- [18]李大钊.战后之妇人问题[J].新青年,1919,(2).
- [19]田汉.田汉全集:第18卷文论[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
- [20]陈望道.我想:二[J].新妇女,1920,(4).
- [21]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 [22]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理事研究室.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 [23]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J].新潮,1919,(2).

-
- [24] 存统. “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J]. 星期评论, 1920 (劳动纪念号).
- [25]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 [26]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 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 (1921—1927) [M].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1986.
- [27] 游鉴明, 罗梅君, 等. 民国时代的中国妇女[M]. 台北: 左岸文化出版社, 2007.
- [28] 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 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 第一册 (1918—1949) [M].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1987.
- [29]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妇女解放[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8.
- [30]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31]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 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 (1937—1945) [M].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
- [32]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 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 (1945.10—1949.9) [M].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
- [33] 李达. 李达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 [34] 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 (1915—1949) 劳动界劳动与妇女[M]. 湘潭: 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4.
- [3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 第二集[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9.
- [36]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运动历史研究室. 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 (1927—1937) [M].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
- [37] 揭爱花. 现代中国妇女解放话语体系的转型与重构[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3, (3).
- [38] 耿化敏. 中国共产党妇女工作史 1921—1949[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 [39] 陈丽珠, 黄秀华, 等. 广东妇女运动历史资料: 1[M]. 广州: 广东省妇女联合会, 广东省档案馆, 1990.
- [40] 沈雁冰. 怎样方能使妇女运动有实力[J]. 妇女杂志 (上海), 1920, (6).
- [41] 君宇. 女权运动者应当知道的[J]. 向导, 1922, (8).
- [42] 向警予. 国民会议与妇女[J]. 妇女周报, 1924, (63).
- [43] 向警予. 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在中国妇女运动中的地位[J]. 妇女周报, 1925, (68).

注释:

1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李超是一位追求新式教育，反对封建家庭的进步女青年。作为家中嫡女，李超不仅没有得到父亲的遗产，还被享有财产继承权的嗣兄断绝生活来源，并被逼婚。1919 年，在多重压力下，她染上严重的肺炎，最后因无钱医治去世，得到社会舆论的普遍关注。胡适为其写了《李超传》，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等也参加了其追悼会并发表演说。